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臆想的“欧洲中心论”

黄建刚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60)

【内容摘要】韦伯在本书的重要贡献是探究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意义。事实上也是在告诉我们宗教思想解放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重要性。这种理论探讨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是中国学术界一些学者却认为韦伯是“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这种结论无疑是错误的。而对韦伯理论臆想出“欧洲中心”后,又乐此不疲地加以批判,实在是不良风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需要的是理性对待西方先进文化的态度。而一些学者对难以接受的西方理论观点动辄以“欧洲中心论”批判之,则是根本错误的文风。

【关键词】新教伦理 资本主义精神 臆想的“欧洲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5-0109-04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中,韦伯试图回答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心理条件。并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发生在欧洲,而没有发生在印度或中国。韦伯认为关键是新教改革后“新教推动了宗教虔诚与商业的结合。”^{[1](P34)}

最近20多年里,我国部分学者对韦伯在本书观点持批判的理由是:韦伯在本书中宣扬“欧洲中心论”的错误观点。那么韦伯是否宣扬了“欧洲中心论”,让我们先了解一下韦伯在本书中的主要思想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韦伯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何在呢?用他的话来讲,就是研究“对资本主义的适应性与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宗教因素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些宗教因素甚至在当时就以与现在大致相同等形式存在着”^{[1](P192)}。韦伯是要“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量的传播。更近一步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到宗教力量那里追根溯源”^{[1](P211)}。

这是个有益的探索。事实上,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宗教思想笼罩着欧洲,思想是不自由的,精神被束缚在教堂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欧洲就像更新了空气一样,不仅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而且传统的商业活动也赋予了新的含义,并孕育了勃勃生机的资本主义。当然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伦理观念是其重要的诱因。韦伯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等国虽也存在着繁荣的商业,却没有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原因。韦伯认为这与欧洲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有关。

可见,韦伯是在研究资本主义所以诞生在欧洲的宗教方面的原因(即相当于国人探索南北朝后隋唐兴盛的原因,这本身是个正常的研究)。这是这本书的初衷,也是目的。

二、国内学者对《新教伦理》的态度

限于篇幅,仅将国内学者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态度介绍一二:

中国社科院林甘泉认为:韦伯是“欧洲中心论”的重要鼓吹者,为什么呢?林甘泉先生的理由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竟然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制度只有在新教伦理的西方国家才能产生^[2]。

北京大学教授马克垚说:“认为东方发展不起来,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最著名的理论,到今天依然强有力的理论,是韦伯的理性之说。这和韦伯的清教理论有很大的关联”^[3]。

韦伯的本意是要研究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精神得以确立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宗教改革的意义。但是经我国学者的批判,韦伯理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再也看不到韦伯本书中所论证的思想解放的意义,而只是看到所谓的“反欧洲中心化”观点的鼓噪。

三、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内容

韦伯在本书中,首先说明的是宗教改革对新的伦理观念形成的作用以及新教伦理的内容;其次说明的是新教伦理的内容;再次说明的是新教伦理观念孕育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正由于中国、印度等国没有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所以资本主义就只能诞生在欧洲。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恰恰是新教改革的意义所在。

1. 新教伦理

首先我们先看宗教改革的意义:

路德开创的教义认为,任何一种劳动,即人间的任何活动都已得到宗教的认可。这一点很了不起。韦伯认为,“这是宗教动力转向日常劳动的关键一步,他最终将产生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精神。”^{[1](P36)}

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自宗教改革

* 作者简介:黄建刚,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与法律。

之后诞生的新教伦理孕育出新的伦理观念——追求物质生活与享受。路德“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P205)}至关重要，“宗教改革本身的影响只是极大地提高了对履行天职的有组织世俗劳动的道德重视和宗教认可。”^{[1](P206)}

那么宗教改革家们是不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而进行的宗教改革呢？显然不是。事实上，韦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必须永远记住，伦理观念改革的方案从来就不是任何宗教改革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既不是道德文化团体的奠基人，也不是社会改革或文化理想的人道主义规划倡导者。灵魂的救赎，而且仅仅是灵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核心。”^{[1](P210)}

“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甚至是不希望出现的劳动成果。”^{[1](P210)}宗教改革只是改变了宗教崇拜的形式，不是将信徒带回人间。所以，韦伯并不认为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因为在宗教改革前，就已存在了资本主义的商业组织形式。

上述论述说明，韦伯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宗教改革家们始终期待的结果。它只是宗教改革后，欧洲社会无意中得到的财富而已。

其次，我们再看看韦伯在本书中对新教伦理观的总结：

韦伯认为：天职一词的观念“也是暂新的，是宗教改革的产物。”^{[1](P204)}韦伯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谈起。路德认为修道院的生活毫无价值，“他（指路德——笔者注）把放弃现世的责任看作是自私的产物，是在逃避尘世的义务。相反，履行天职的劳动在他看来是博爱的外在表现。”^{[1](P204)}劳动即是天职，这是路德的决定性贡献。

把履行尘世事务（即劳动）作为天职，引申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他抛弃了天主教的道德戒律。在路德看来“令上帝满意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以修道院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只是履行个人在尘世的地位所加诸于他的义务”^{[1](P204)}。

那么，宗教改革的后果是什么呢？

“强烈地虔诚和高度发达的商业头脑相结合，也充分体现现在虔信派教徒身上，这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1](P179)}

其实，韦伯认为，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也是改革家们始料未及的事，路德的初衷也仅仅是反对教会的“赎金券”，反对教会将教徒束缚在教堂里。但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就是对劳动、劳动成果的热烈追求。这种追求，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

2. 韦伯理解的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确是追逐利润的，但贪得无厌的追求利润不等于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意味着采用理性的企业手段不断的追逐利润。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教诲来解释他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内容“切记，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可以再生增值。……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守信、按时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其他朋友们的所有闲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

俭，……如果事关个人信用的影响，哪怕十分琐碎也得注意。”继而韦伯又指出“富兰克林的全部道德态度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雀，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1](P182-185)}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富兰克林原则”。

韦伯似乎也觉得这种概括有些缺陷：“这就是以典型方式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我们不能断言，它们一览无余地囊括了有关这种精神的一切。”“‘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这一独特的贪婪哲学看上去成了那种公认为有信用的诚实人所抱有的理想。……这里宣扬的不单是一种发迹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伦理”^{[1](P184)}。正因为如此，韦伯强调：在中国、印度、古希腊因缺乏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所以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韦伯断定：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只要合法挣钱，就是对劳动这一天职观念的尊重，而这就是“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容”^{[1](P186)}。

“要尽到天职的义务，这一独特的观念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1](P186)}

韦伯认为“引用的富兰克林教诲中所表现的那类心态”，对于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里“富兰克林原则”是嗤之以鼻的，但像中国的官吏、古罗马贵族或是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对金钱的无耻程度远甚于资本主义的英国人，“一切尚未卷入或尚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社会群体，仍然会对他嗤之以鼻。”“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一直是落后的，但恰恰是那些国家，却一直具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普遍特征：靠赚钱以谋取私利时的绝对无耻。”^{[1](P188)}

韦伯认为，把资本主义理解成为对金钱的贪得无厌是错误的。因为对金钱的贪婪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人们对金钱也如此贪婪，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呢？因为“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赚钱欲望的发达程度上。”^{[1](P188)}虽然财迷心窍的心理，伴随着人类的成长，且已呈失控的情形，但并不代表这是资本主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就不等于贪得无厌。

四、《新教伦理》的贡献与不足

韦伯反复强调的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确立的意义，并由此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容。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宗教改革的意义。

我们先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得到例证：

1978年，我国现代化的脚步是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始，在“解放思想”中艰难地行进的。最初中共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也仅仅实行“下放企业自主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我们并没意识到，“改革开放”给我们民众带来的思想、文化的冲击。而今当我们回顾历史，或许才意识到，与当年的初衷相比，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得很远。当经济体制、经济生活发生巨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也必将会掀起一场革命。

韦伯探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之间的关系就

在于说明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形成的意义。

路德改革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对于宗教教义的歪曲,反对教会人士对《圣经》理解的垄断。路德提出只要心中有上帝,人人都可以自己实现灵魂的救赎。但是宗教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的后果,则已超过改革的初衷。

所以,韦伯比较客观地认为宗教改革本身不是为了引出资本主义精神。但是宗教改革所摆脱的精神枷锁,则是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即思想一旦冲破精神的牢笼,从而获得解放以后,就不再受“解放者”思想的约束。这种革命的逻辑,在历史上已经不止一次的重演。这就是我们学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意义。这就是韦伯的贡献所在。

既然基督教束缚人们的思想、精神才出现的宗教改革,那么佛教是开放的,一开始就没有韦伯理解的那种对人的思想、精神束缚。为什么比较宽容、温和的佛教没有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呢?又如在中国,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也是开放宽容的,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这种“资本主义精神”?

其实韦伯著作中,已经代我们反驳了他的观点:“中国的官吏、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农民,他们的贪婪和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逊色。不管谁都可以发现”^{〔1〕P188}。除了对利益的贪婪追逐,这些地方也不乏有人崇尚节俭。为什么这些地方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呢,看来仅仅依靠对财富的贪婪欲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制度的维护。

所以,把资本主义精神仅仅归功于宗教改革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没有人性的解放,没有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没有民主制度的发扬光大,就没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建立,连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基础都没有,何来“资本主义精神”呢。所以将资本主义精神仅仅归结为新教伦理后形成的“富兰克林原则”是有些偏颇的。

韦伯提出:“我们的个人主义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具有一些为我们的经济秩序所独有的组织形式和总体结构形式。现在,在这些制度下,一如上述,资本主义精神可以理解纯粹是适应的结果。”^{〔1〕P198}

显然韦伯也认识到,没有制度的保障,没有“经济秩序所独有的组织形式”这一经济环境,资本主义精神即使存在,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上述理解也失之偏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的保障”等等政治、法律原则是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呢?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统治全球,就是因为有这个比较完善的制度、原则作为保障。

所以我们从宗教改革探讨思想解放的意义开始,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停留于此。宗教改革不仅是引申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更重要的是思想解放后,对人的尊重,对合理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保护。而恰恰是这些合理的制度才保障了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存续。

五、需要理性认识《新教伦理》

首先,历史事实是:在宗教改革前的欧洲,基于《圣经》关于人类原罪的学说,信徒为免除原罪而必须忏悔、祈祷。人的全部世俗生活就是围绕着教堂的礼拜,当我们购买了

教堂的赎罪券,牧师就会帮我们赎罪。宗教不仅控制了世俗,也控制了政治。经院哲学研究的庸俗化,禁锢了科学、艺术与文化。教皇除了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精神地位,还控制着信徒世俗生活的财产(教产数量庞大)。

路德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人们都可以救赎自己,他强调“因信称义”,废除赎罪券,只要心有上帝,内心向善,勤奋劳动,就是在做赎罪的功。这一观点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引起的震动显而易见,它不仅把人们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将人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创造财富。对上帝的崇拜的同时,又焕发对生活的热爱。所以卡尔·马克思评价马丁·路德时说“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但是却树立了信仰的权威”。

其次,韦伯一开始探讨从宗教力量中追寻资本主义化。他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可以从宗教力量里追根溯源的。而且已经找到——劳动是天职、节俭、追逐利润、讲信用。

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精神障碍,和“文艺复兴”一起,共同成为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繁荣的里程碑。

所以笔者认为,韦伯作为一种研究思路,研究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确切地说是与新教伦理的关系,的确是一种新颖的方式。同时也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宗教作为对人的精神、思想影响极大的意识形态,既可以束缚人的思想,从而使信仰者成为一个,但也可以赋予人自由的精神。开放的宗教,思想都是宽容的,也更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比如佛教就很少极端分子,经过改革后的基督教对待其他文化也逐渐趋向宽容。

六、中国学者对韦伯理论的臆想

国内学者以本书为根据批判韦伯的理由如前所述。那么韦伯的这本书与“欧洲中心论”到底有何联系呢?

让“反‘欧洲中心论’”者们乐此不疲的观点是:认为“欧洲中心论”宣扬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者就是宣扬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例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集团。

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本身就与文化优越性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因为种族主义本身就不是文化,而是占领者宣扬的一种强盗逻辑。当然就无所谓文化优越论。而殖民者实行统治时,在殖民地宣扬并强行推行殖民者的文化,则是统治的需要。

从韦伯的这本书里,不存在韦伯宣扬什么种族主义。而所谓的宣扬殖民主义更是“臆想”。如果认为韦伯说欧洲以外的地区发不出资本主义,就是宣扬的所谓“种族主义”,这纯属“反欧洲中心论”者断章取义后缺乏逻辑的胡思乱想。

韦伯的研究显然不是宣扬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首先,韦伯并没有说什么资本主义发生在欧洲,是因为欧洲的血统、民族原因。其次,韦伯在本书中更没有说资本主义发生在欧洲是因为欧洲的文化。而是探究宗教改革对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的意义。韦伯只不过是研究资本主义文明所以兴盛的宗教原因而已,这哪里是在宣扬种族与文化优越呢?至

多也是津津乐道于新教的优越而已(不是基督教的优越性)。心生“臆想”,真就看不懂韦伯的著作了吗?

历史学家马克垚教授在其文章中说“欧洲中心论的最有力论点,就是东方各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或者说靠自己实现不了现代化。”^[1]

看来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分析探讨。先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首先,不仅是欧洲人认为东方各国自己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实际上我国的许多学者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本身孕育不出、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一个简单的理论探讨问题,而反对者却斥之为“欧洲中心论”或“受欧洲中心论思想影响”。这就使人奇怪,为什么一旦认为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就被我们痛斥为“欧洲中心论”了呢?中国历史上是有“党同伐异”的。而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愈加不能容忍欧美学者(也包括历史上的欧洲学者)对我国的非议,哪怕是中肯的批评的意见,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到底能否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主要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上研究,且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4]。当然,不论学术研究的观点如何,都是有价值的探讨。但是坚持科学、理性的研究精神,恐怕是不容置疑的。

认为中国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认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可以产生出资本主义。也有不少学者附和这一“传说”,这种观点也是可以讨论的、研究的。先不管是否合适,至少此观点可以体现两种意思:一来可以提高国人的自信心——你看,没有欧洲的入侵,我们也可以独立地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不足为怪,我们有夜郎自大的悠久历史。这方面的神话我们演绎得多了,臆造的宇航员在太空中能看到中国长城,就是其中一例。二来,由前一个观点可以再引申出一个结论: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欧洲列强入侵的结果——还可以增加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凝聚民族感情。

认为中国能独立发展到资本主义的人们,难以解释的是:同样是被迫打开大门的中国和日本,日本过去连资本主义的苗苗都不知道,为什么一旦打开国门,资本主义的经济就发展得那么快。而我们自诩为在宋朝时期就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怎么都经过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催生,就催不出资本主义的“麦浪”呢?也许有些人还会说,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掠夺使我们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夭折了。那又如何解释,既然你在宋朝就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什么到1840年,已经七、八百年时间还没有长出大工业。

仅仅是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西学”浪潮,我们就都搞出了民族工业,而这个工业还是我们后来抗日战争的经济基础。这如何解释你能自发产生出资本主义呢?难道还不够“萌芽”长成的时间,难道还要再过几百年,恐怕反对者们仍会陶醉于将此归结为欧洲列强的侵略。有些人就是不愿从自身的文化环境寻找落后的根源。这种落后的思维方式,自明清时就有了。而有了这种思维,就注定了落后。

其次,是不是认为“东方各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观点就等于鼓吹欧洲中心论”。显然这种推断是没有逻辑必然性的。实际上,东方各国就是没有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来,这是历史事实,还需要论证吗?我们有些人习惯于推理——没

有欧洲入侵,东方各国也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反过来想一想,没有欧洲入侵,东方各国会不会至今还是农业、游牧的生活状态?两种可能性,我们总是没有逻辑必然性地、一厢情愿地设想“可以独立发展成资本主义”的结果。这就有些荒唐了。

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崇尚的辩证法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多种可能性。从事物的可能性发展到现实性,必须具备发展到现实性的必然理由。那种认为“欧洲人能独立进入资本主义,亚洲人尤其是我中国人也同样如此”的观点既违背了基本的哲学原理,又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它否定了文明发展的特殊性,更否定了文明发展的前提。很显然,哪个民族能复制中国的隋唐文明呢。有些人就是不愿据此再回答一个问题:既然都能狂想出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来,为什么就生不出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法律制度呢?我们还要自发地等多少年长出这些硕果呢。

我们三十多年的经济成就,是在开放中改革身体制弊端的结果。而引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学习、引进国外谁的先进技术,核心就是美日、欧洲的。而按照反“欧洲中心论”者们的逻辑,这是不是又唯美日欧洲马首是瞻了呢,会不会又提出为什么不学习印、非、阿拉伯的技术呢。这不是典型的在经济技术上鼓吹“欧洲中心论”、“洋奴哲学”嘛。按照哪些“中国也能独立发展到资本主义”者们的观点反推,我们引进技术干什么?我们也能独立发展研究出来呀,尽管有些人由此还可以衍生出许多诡辩来,但还是违抗不了事实。有些人就是没有想到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渐进性与条件制约性。

那些提出“反‘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们”能不能告诉我们,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除了对西方某些理论歪曲后再批判外,是不是也学习了其中可贵的精神品质、思想精华呢?能不能告诉我们除了批判,是不是发现并认真地学习了西方文化中合理的内涵呢?

当国内学者从感情上难以接受“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观点,就失去理智地臆想出韦伯是所谓“欧洲中心论”集大成者。这至少是不严谨的,也不合逻辑。韦伯在本文中确实提出了像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发展不出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能不能深入的反思、研究,就事论事。而不陶醉于臆想而进行随意的批判。如能认真地分析一下我国理论界在最近三十年发表的,批判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的文章,就会发现批判观点是根本不成立的。

“反‘欧洲中心论’”的危害性在于,通过臆想出的“欧洲中心论”,并乐此不疲的批判。其结果是严重影响了我们理智地学习先进的文化、理论与思想。尤其是学术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林甘泉.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6).

[3]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J].历史研究,2006(3).

[4]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